

“大国学术”*

——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督教中国化

• 徐以骅

[内容提要] “大国学术”是大国综合学术能力的统称。“大国学术”的基本条件或标准是所谓理想型和动态性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世界只有少数学术强国才能达到。因此，“大国学术”可以说是“学术强国”的代名词。如“制造业大国”与“制造业强国”“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差别一样，从“学术大国”到“大国学术”显然还有很大的跨度。作为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相对较弱的学科，宗教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中国能否作为“大国学术”的试金石之一。本文试从“大国学术”的高标准出发，讨论当前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督教中国化的现状。

[关键词] “大国宗教” “大国学术” 基督教中国化

* 本文有关数据统计工作得到笔者研究生黄廉睿的协助，特此感谢。

近年来,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和天津人民出版社为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研究,准备出版大型海外收藏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史料汇编,组织人员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档案馆(The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和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部(Special Collection,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Yale University)等处大规模复制有关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档案资料。这两处档案馆也是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资料中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历史资料收藏和整理显然是关于基督教中国化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而上述两处世界级基督教资料中心的大量馆藏资料也引起笔者对基督教中国化学术研究的一些思考。

2017年我曾提出“大国宗教”的概念。如果“大国外交”“大国经济”“大国宗教”等概念成立的话,“大国学术”一说当然也能成立。本文在界定“大国学术”的基础上,以此“大国学术”作为参照系来审视基督教中国化学术研究的现状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

一、从“大国宗教”到“大国学术”

“大国宗教”概念是笔者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①“大国宗教论”认为,就一般而言,构成“大国宗教”的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素:(1)绝对数值要素。如同经济和国力评估一

^① 徐以骅:“大国宗教(代序)”,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六辑),时事出版社,2016年12月版,第3—10页;参见徐以骅:“从‘信仰中国’到‘信仰周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宗教互动”,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五辑),时事出版社,2016年10月版,第10—13页。

样，一国宗教的强弱不仅要看相对数值，可能更要看绝对数值。除非较极端的个案，如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梵蒂冈教皇国，大国在宗教信徒及宗教场所和机构上的绝对数值，均非小国所能比拟。(2) 硬件要素。包括圣地、圣物、宗教人口、宗教场所、传教和宗教非政府组织、宗教神学院校、宗教传媒等。(3) 软件要素。包括政教关系、宗教政策和实践、宗教和神学思想、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宗教领袖，以及宗教的受社会尊重度等。(4) 国力要素。一国宗教影响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该国国力的强弱，即该国宗教所凭借的物资条件、社会基础乃至国家地位。在国际舞台上，尤其在国际慈善、世界和平以及跨国跨文化交流和对话等领域中真正有能力把宗教抱负付诸实施的，还是大国宗教和以大国宗教为依托的国际性宗教团体和宗教非政府组织。

长期以来，“国强教弱”或“强国弱宗教”是关于中国宗教的一般看法。所谓“弱宗教”是指信教人数占总人数中的比率比较低，以及国民的宗教性和虔敬度较弱等。其实鉴于东西方宗教的差异，宗教性和虔敬度是很难准确测量或加以比较的。而所谓“国强教弱”说法的更大不足，则是忽视国家与宗教之间的相互作用。结合上述“大国宗教”的要素、尤其是宗教人口（近2亿）和宗教场所的绝对数值以及国家综合实力而言，“大国宗教”可能是对中国宗教现有格局尤其是潜在力量的更好描述。

当然与其他领域相比，我国宗教的基础设施、神学思想、体制建设、研究水准和话语权不仅与国际水准有较大差距，也与我国不断增长的文化事业和总体国力不相匹配。因此，作为大国宗教，我国宗教和宗教团体仍有不少在短时间内难以补齐的短板，其国际影响力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美国宗教和中国宗教可能同属大国宗教，但两者之间的差距，要远远大于同属

大国经济的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差距。

与“大国宗教”相比，作为综合学术能力统称的“大国学术”的形成需要以下基本条件：

- 需要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庞大社会和经济资源的支持；
- 拥有本国体制完备、国际一流的高等教育，留学生教育，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系统；
- 拥有国际公认的知识 and 理论体系、强大的学术原创能力、活跃的学术批评、严格的学术诚信制度、公平的学术评价体系，以及充分的国际话语权；
- 拥有广泛的国际战略布局、丰富的国际学术交流经验、完整齐备的档案文献和数据资料，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学术公共产品；
- 依赖高水准的国民科学素质、持续稳定的国内政治、坚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宽松开放的学术环境。

以上对“大国学术”基本条件的粗略描述主要针对人文学科和哲学社会科学，当然对自然科学而言情况也大致相同。

二、“大国学术”抑或“学术大国”

以上开列的“大国学术”的基本条件是所谓理想型和动态性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只有少数学术强国才能达到，因此“大国学术”可以说是“学术强国”的代名词。如“制造业大国”与“制造业强国”“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差别一样，从“学术大国”到“大国学术”（“学术强国”）显然还有很大的跨度。

首先，各国内部的学术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自然科学与人

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往往会有一定的差距和滞后。就中国而言，目前在自然科学领域，尽管还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弱项和亟需去除的短板，一些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但无论就国际期刊发表、高被引用科学家、高等院校、发明专利、科研资金投入等国际排名数据来看，近数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快速发展，在不少方面已居于世界前列，如中国发明专利数量的排行，近年来就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科技成果亦不断涌现。与自然科学相比，中国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近年来虽不断取得进步，但不仅仍与国际先进水准有差距，而且还落后于本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如前所述，无论“学术大国”还是“大国学术”都体现了国家综合学术能力。而中国综合学术能力的提高，显然更得益于自然科学的发展。

其次，即使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之内学术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学科相比，中国宗教学的发展命运多舛。在1949年建国到“文革”结束的近30年时间里，宗教研究被宗教批判取而代之，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宗教政策类论著占据了本来就已大大萎缩的宗教出版的主导地位。就基督宗教而言，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的30年间，在该研究领域带有学术性的论著只有杨真（即赵复山先生）所著《基督教史纲》（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其他大多是涉及“反洋教运动”的近代史论著。即使同受政治运动的影响，与作为本土或本土化宗教的佛教、道教相比，基督宗教研究也是受损更大的“重灾区”，目前就学术研究的原创性而言，中国的基督宗教研究恐怕尚不能比肩传统佛教、道教研究，就学术研究的条件和积累而言，那就更是瞠乎其后者了。近年来中国基督教学术研究尽管发展迅速，但先天不足、欠账太多，要追赶国内其他领域或者对其他宗教的学术研究尚

需时日，更遑论赶超国际水准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各科的发展不平衡是普遍现象，并且往往受制于一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禀性和国际处境，如当今美国的国际关系学可说是独步天下，但在哲学和历史学等领域，德、法等国完全可与美国分庭抗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再次，中国的基督教研究本身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目前的现状是学界强于教会，历史研究强于现状研究，对本国的研究自然也强于对外国的研究。用20世纪中国最著名基督教神学家赵紫宸的话来说，中国宗教史上不乏“伟大的思想家”，但直到1948年，“中国教会还未向普世教会贡献任何神学思想家和著作家”。^①即使到今天，中国基督教对普世教会的贡献主要还是在实践领域，而基督教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些所谓“元理论”也主要出自国外，这使国内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外有关学术理论的注解和案例分析。以本国基督教为中心的学术关注，尤其在基督教史领域，固然源于现实之需要、档案资料之难得以及学术积累之不足，但也严重限制了中国基督教研究的国际视野，如我们研究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通常就将其纳入基于本国历史的较窄框架，而忽视其国际性，这便使波澜壮阔的中国基督教历史及其现状，并未对国际基督教运动研究产生应有的影响。中国基督教研究缺乏国际性，当然还有从语言障碍到西方学界对非西方学术的偏见等诸多原因，并且学术研究还往往滞后于现实发展，如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中国经济学理论却并未产

^① 赵紫宸：“今后四十年中国基督教教义神学可能的发展”，载《金陵神学院》第26卷第1—2期合刊，1950年11月，第14—15页；徐以骅：“神学教育家赵紫宸——兼论大学与神学教育”，载徐以骅：《中国基督教教育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

生相对应的研究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到了体现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高度，并且把宗教学等11个学科称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① 作为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相对较弱的学科，宗教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中国能否生成“大国学术”的试金石之一。

三、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督教中国化

基督教“中国化”并不是全新的观念，过去就有“本土化”“本色化”“处境化”等提法。目前无论教界还是学界，都对基督教中国化有不同的界定，此处不再赘述。笔者在基督教全国两会召开的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上指出，基督教中国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提出的推动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②

基督教中国化有理论和实践层面，其学术研究有分别来自教界、学界和政界的贡献。为讨论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督教中国化，我们利用中国最大的学术期刊网——中国知网的文献库进行检索，在系统中分别输入关键词“佛教中国化”“道教中国化”“伊斯兰教中国化”“天主教中国化”“基督教中国化”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7日第2版。

^② 徐以骅：“历史回眸与时代使命：在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天风》，2017年第12辑，第8页。

“宗教中国化”检索出相关文献，剔除重复项与不相关项，得到上述关键词为主题的文献总计 727 篇（截至 2018 年 3 月 26 日）。各年度发表文章数量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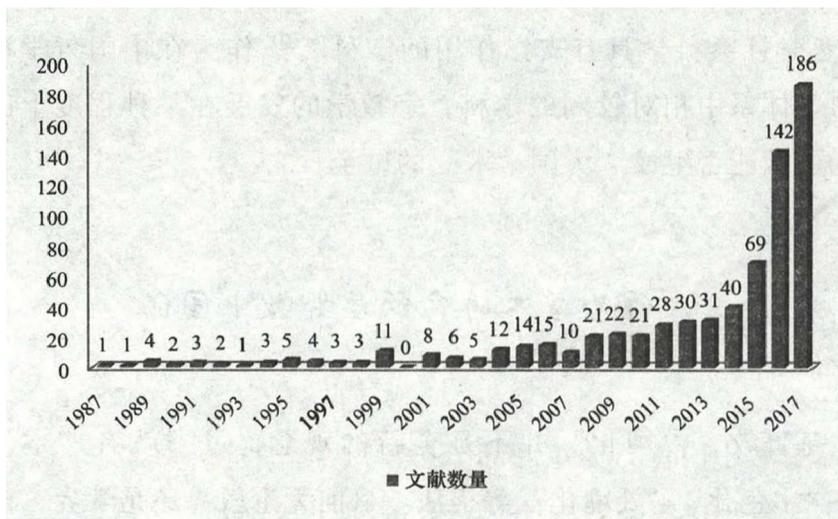


图 1 相关文献发表年度分布图（未含 2018 年的文献数量）

从图 1 可见，中国出现宗教“中国化”标题或关键词的学术文章出现在 1987 年，该文是赖永海所撰“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载《浙江学刊》1987 年 5 月），而第一批其他关于“宗教中国化”文章所论述的也是“佛教中国化”。^① 第一篇标题或关键词中有“基督教中国化”一词的学术文章是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王美秀所撰“基督教的中国化的难点”（载《世界宗教研究》1996 年 3

^① 如尤西林：“从佛学到佛教：佛教中国化的实质”，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 年 10 月；罗义俊：“佛教中国化的先驱释道安——论释道安‘因风易俗’的弘法思想”，载《法音》，1989 年 4 月；黄新亚：“论佛教的中国化问题”，《人文杂志》，1989 年 5 月；龙达瑞：“佛教的中国化初探”，载《宗教学研究》，1989 年 12 月；徐效刚：《慧远与佛教中国化道路》，载《东南文化》，1990 年 5 月。

月)一文。

图1同时表明,从1987年迄今,“宗教中国化”文章的期刊发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2004年为界,此前每年期刊发表文献的数量都是个位数;第二阶段以2015年为界,此前期刊发表文献的数量除2014年为31篇外,其余每年均在20篇上下;2015年后为第三阶段,在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4月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之后,宗教中国化文献的期刊发表数量便有了跳跃性的增长。

在上述727篇文献中,以“佛教中国化”为主题的相关文献196篇,以“道教中国化”为主题的7篇,以“伊斯兰教中国化”为主题的109篇,以“天主教中国化”为主题的41篇,以“基督教中国化”为主题的189篇,以“宗教中国化”为主题的185篇,在各宗教中国化文献的期刊发表上,佛教与基督教大致平分秋色,以下依次为伊斯兰教、天主教和道教,其比例分布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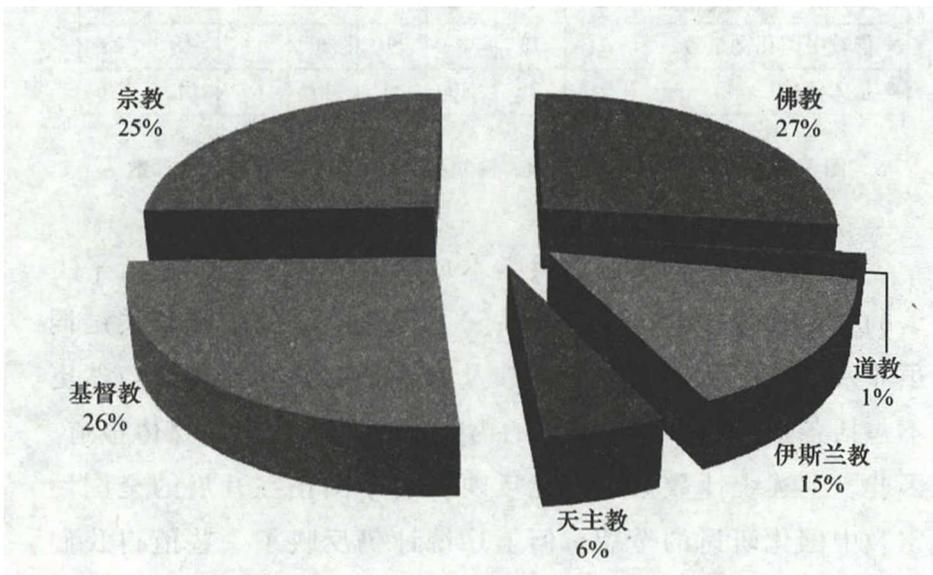


图2 各宗教中国化学术期刊文章不同主题比例分布

作为宗教中国化的典范，佛教中国化学术研究的相对发达比较容易理解，而基督教学术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一直领宗教学术研究风气之先，故在“宗教中国化”研究中也处于相对优势地位，而此种地位在近年来更为明显。对2010年至2017年“佛教中国化”“基督教中国化”的学术文献数量与总数量进行比较，结果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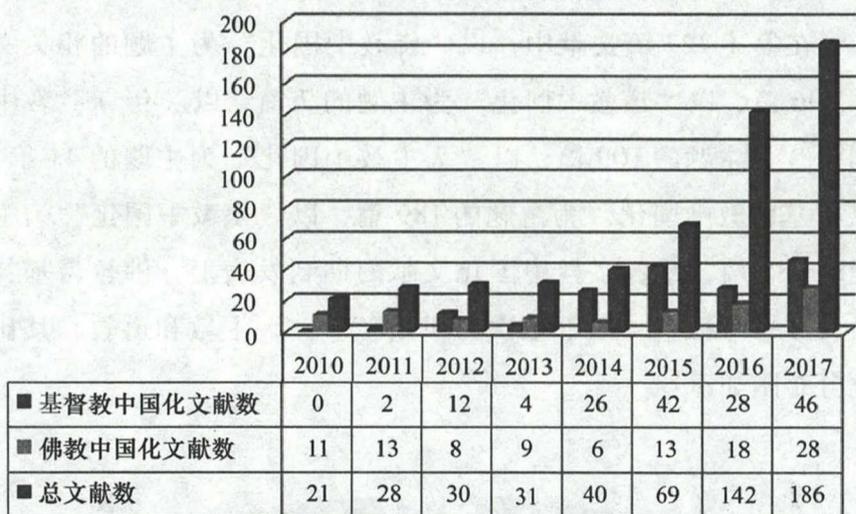


图3 2010—2017年间基督教、佛教和宗教中国化学术期刊文章数

中国知网不收录著作类学术成果（如张志刚、卓新平主编的《基督教中国化系列丛书》），不包括一些题目和关键词虽非宗教中国化，但内容却涉及该主题的学术论文，当然更不包括各宗教团体非学术性的内部出版物以及大量媒体报道。因此，上述统计数据并不能反映目前中国正在开展的全国性宗教中国化研讨的全貌。但上述统计仍反映了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基督教中国化学术研究的全面开展虽然为时较晚，但过去30年间总共发表185篇学术论文的规模与基督教中国化作为学术议题的重要性相比，还是显得相当单薄。

其次，即使在这185篇文章中，标语口号式的文章多，深入细致的研究少；基于文献的多，基于实际的少，对基督教中国化的研究还不足以对中国基督教学术研究产生引领作用。

再次，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学术研究，很少具有比较的视角，即对世界各国各地区基督教或基督宗教本国化的异同和路径做深入的比较研究，这同样妨碍基督教中国化学术研究的推进和国际学术对话的展开。作为学术研究，基督教中国化学术研究只有走出国门，才能具有中国基督教乃至中国学术应有的国际格局。

最后，正如中国基督教会目前尚未建立作为基督教中国化最高层次的基督教神学思想体系一样，中国基督教学术研究亦未建立自身完整的理论、方法、话语和资料体系，还不足以对中国基督教会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努力以及对做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提供有力的支撑。因此，中国基督教研究界应充分利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外基督教学术的丰富资源，借助目前这场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远远超过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基督教群众性神学大讨论的基督教中国化大讨论的强劲东风，为早日建成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基督教研究学术体系做更多的基础性工作。

本辑分为美国宗教、宗教与国际关系、学术讲座三个栏目。本辑的主办单位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和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

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的博士后段世磊、谢子卿、王佳尼博士以及中心学术助理刘倩洁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编辑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主编简介：

徐以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系哲学博士、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评审专家、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工作专家库特聘专家、金陵协和神学院院董等职；上海市政协委员。研究方向包括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与中国社会、中国基督教史、美国宗教等。创办并主编学术丛刊《宗教与美国社会》《基督教学术》（与张庆熊共同主编）、《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以及《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论丛》。

感谢关注时事出版社



时事出版社
官方网站



时事出版社
官方微信公众号

著（译）者简介

肯尼斯·沃尔德 (Kenneth Wald)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政治学杰出教授

阿利森·卡尔洪—布朗 (Allison Calhoun - Brown)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

葛百彦 (Brian J. Grim)

美国宗教自由与企业基金会总裁

葛天恩 (Melissa E. Grim)

美国华盛顿特区新闻博物馆研究院研究员

阿兰·鲍尔 (Alain Bauer)

法国国际科学技术与管理学院犯罪学教授

徐以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钮松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李意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章志萍

海军军医大学外语教研室副教授、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